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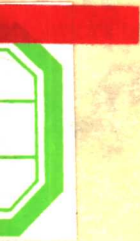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葡】安文思 著
何高济 李申 译

中国新史

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



中国新史

〔葡〕安文思 著

何高济

李申 译

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史/(葡)安文思著;何高济,李申译,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7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7-5347-3436-3

I. 中... II. ①安...②何...③李...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 IV. 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2392 号

本书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策划并组织翻译,特此致谢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中国新史

著 者 [葡]安文思
译 者 何高济 李 申
责任编辑 张 锐
责任校对 崔博志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出 版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七路25号 邮政编码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大象出版社总发行部(电话:0371—3863556)
制 版 河南大象出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4年7月第1版 2004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印张 890×1240 1/32 8.5印张
字 数 201千字
印 数 2500册
定 价 18.0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12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5957860-351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

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录,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新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录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中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的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

何国家的文化都必须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文化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年5月

出版说明

清代入华传教士关于中国的历史文献在清代的外文文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不仅研究西方汉学若不从此入手,就无法掌握和真正了解西方汉学的来龙去脉及其知识演化和变迁的内在原因;同时,研究中国明清基督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若不掌握入华传教士的相关文献,也无法进入其历史的内核。多年来,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停留在“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上,直接研究外文原始文献和档案的较少,翻译出版的史料也很有限,这或许是该领域的研究总是进展缓慢、鲜有创造的一个原因。

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大象出版社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合作,自1999年起组织出版了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丛书,从基本文献的翻译入手,分三个系列向国内读者介绍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本书系已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五”期间重点图书出版项目,目前已陆续出版十余种。在继续致力于这一书系组织出版的同时,为配合国家的清史文献的整理出版,我们将部分有关清代传教士著作和文献的译著,从这套书系转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编译丛刊”中出版,特此对读者诸君作一说明。

学术乃天下公器。清史纂修,世纪大事,我辈能参与其中,为之尽心,足矣!

大象出版社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2004年6月



安文思墓碑

中文版序言

1688年在巴黎所出版的葡萄牙人华传教士安文思的《中国新史》是西方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与此前在西方出版的利玛窦和金尼阁的《天主教进入中国史》(1615)、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2)、卫匡国的《鞑靼战纪》(1654)、《中国新图》(1655)、《中国上古史》(1658)一起构成了西方17世纪关于中国知识的最重要来源。国内学者计翔翔认为这部著作是西方早期汉学第一发展阶段的一个总结和第二阶段发展的起点,甚至认为它已经走出了传教士汉学的框架。^①

从汉学的角度来看,他对中国的介绍更为系统和全面。从中国的名称、地理位置、历史、语言、风俗到中国的物质生活、矿产、航运、船舶及政治制度、国家结构等,安文思一一做了介绍,给西方人呈现出了一副中国的全景式图案。安文思写这本书时已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中国已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由于他本人认同

^① 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第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参阅计翔翔:《耶稣会士汉学家安文思及其〈中国新志〉》,《国际汉学》(第九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笔者认为西方汉学的发展经历了“游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三个时期,安文思的《中国新史》在我看来仍处在“传教士汉学”阶段,尽管它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利玛窦的“合儒易佛”的传教路线,他对中国的文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书的原名为《中国十二绝》,实际讲的是中国的十二条优点,即:

1. 中国版图广大(书中第二章);
2. 中国历史悠久(书中第三章及第一、五章的部分内容);
3. 中国的语言文字优美(书中第四章);
4. 中国典籍丰富(书中第五章)
5. 中国人有礼貌和教养(书中第六章);
6. 中国水运的便捷和公共工程的完善(书中第七章和九章);
7. 中国工艺制造精美(书中第八章);
8. 中国物产丰富(书中第十章);
9. 孔子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第十一章);
10. 中国政治发达(书中第十二至十五章)
11. 中国君主之伟大(书中第十六和二十一章)
12. 北京之宏伟(书中第十七至二十一章)。^①

如果和他以前的著作相比,对北京的介绍最为详细,是这本书的重要特点。他不仅介绍了王府街、白塔寺、铁狮子胡同、鲜鱼口这样的街道,还详细介绍了皇城,包括皇城的大小、皇城中的二十座宫殿等。如果不是经常在皇宫中活动,绝不可能对它做如此细的描写。正因为安文思长期生活在北京,他的这些报道和描写不仅推动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了解和认识清代历史的细节和材料,这些在今天依然是很有价值的。

在谈到皇宫每年的赋入时,他给我们提供了下面这些数字:

“1. 每年运进宫廷粮仓的米面达四千三百三十二万八千八百三十四袋;2. 一千三十五万五千九百三十七个盐块,每块重五十磅;3. 两百五十八磅极细的朱砂;4. 九万四千七百三十七磅漆;……”从这些数字中我们才能较为真实地感受到当年清宫生

^① 参阅《耶稣会士汉学家安文思及其〈中国新史〉》。

活的实际状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清宫经济生活的参考数字。

在谈到皇帝祭祀的仪仗队伍时,安文思的记述也十分详细。他写道:“他的仪仗如下:首先,有二十四名执大鼓的人,分为两行,每行各十二人。下面的行列也是如此。其次,二十四名喇叭手,每行十二名。……第二十三,两千名文曼达林,一千名一队。第二十四,两千名武曼达林,全都穿着华丽的礼袍……。”这些文字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使我们对清代皇帝祭祀的仪仗队有了一种更为直观、具体的了解。

安文思的书还提供给我们许多珍贵的清史材料,一旦我们将这些材料和中文文献相互印证,就会补充中文文献的不足,从而加深我们对清代历史的认识。

安文思在书中说,1669年12月8号,皇帝命三位官员到汤若望的墓地焚香,“其目的是向他作特殊的礼敬,又命令赐给当时在朝的三个神甫三百二十五克朗,我是其中之一,支付他丧葬的费用”。此事《正教奉褒》中记载为:“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上遣礼部大员。捧御祭文一道。至汤若望墓所致祭。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供设香案跪迎,恭听宣读。其文曰:‘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卹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天文特异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恩卹,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如有知。尚克歆享。’”安文思说,第二天康熙在宫中宴请大臣时,让他们三人也参加了宴会,他们坐在右面第三排的第一张桌。这点《正教奉褒》没有记载。

杨光先案是清初的大事,书中也有记载,安文思说杨光先“加给汤若望神甫的一条大罪是,在制作天球仪时,他没有标出北极星,中国人称为帝星,即众星的帝王星。因为它不移动,他们说众星都围绕着它。……这个骗子由此得出结论,说汤若望神甫没有标出这颗星,因为他不承认中国的皇帝,因此他是叛逆者,该当死

罪。”另，《正教奉褒》中有“康熙四年三月初一。礼刑两部会议，拟汤若望处死，其余教士俱仗充。初二日，辅政大臣方欲依议批行。忽地地震，惊散未批。”不少人认为这是教内的记载，不足以信。但安文思的书中也记载了这次地震，他是当事人，当时生活在北京。这使我们对这条事实有了新的旁证。

书后所附的利类思神父所写的《安文思传》也是一份重要的文献，在这个传记中所记载的他和利类思在张献忠处的经历补充了有关张献忠的文献。^① 书中写道，安文思死后，康熙赐给他悼词，这可以在中文文献中得到印证。^② 前不久在台湾出版的《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的第十二卷中收有利类思和南怀仁所写的《远西景明安先生行述》的中文文献，此文和《安文思传》完全对应，从而说明《中国新史》作为外文文献的真实性。

现在这个译本是从 1689 年的英文本翻译过来的，个别篇章译自法文本，译者也核对了 1957 年新版的葡文本。虽然，英文版和第一版的法文版相比有了不少改动，^③ 但英文版有一个优点很值得称道，即在许多章的后面加上了注释和说明，将安文思所记的事实和此前在欧洲出版的其他汉学著作进行比较或核对，这实际上是把安文思的书放到了西方早期汉学的学术脉络中加以评价，从中我们也看到了西方人在 16—17 世纪对中国认识的变迁。

张西平

2004 年 6 月

① 参阅《圣教入川记》。

② Albert Chan, s. j.,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p. 453; 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辑汇编》，第 530 页。

③ 参阅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中译者前言

加伯利埃·麦哲伦(Gabriel de Magalhães),汉名安文思,字景明,1609年生于葡萄牙科因布拉州佩特罗加斯村。幼年在其叔父家度过,后就读于科因布拉大学耶稣会书院,十七岁入耶稣会。1634年安文思申请赴印度传教,抵达果阿,在修道院讲授修辞学,两年后赴澳门。1640年随一位信教官员进入中国,到达杭州。因利类思神父在四川传教期间害病,需人协助,安文思遂获允前往,于1642年8月28日抵成都,与利类思共同从事传教工作。张献忠入川,据成都,二人随群众逃往山中。张献忠得知其信息,命人求得,赐以馆舍居住,并命他们制造天文仪器。但张喜怒无常,凶狠残暴,二人欲离去,为张所拘,准备就刑;旋清兵前锋至,张前往侦察,被清兵射死。两神父亦为清军俘获,由肃王豪格送往京师。从此安文思在清廷服务,受顺治优遇,历经1662年教案,于1677年5月6日逝于北京,葬阜城门外。

安文思自1648年到北京,在京一住二十九年,可以说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1668年安文思用葡文写成一部记述中国的书,取名为《中国的十二特点》,未刊印,为手稿本。值中国教团总监柏应理神父至罗马,晋见红衣主教德斯特列,主教询问有关中国,特别是北京的情况,柏应理神父遂将携带的《中国的十二特点》的抄本交给主教阅读,主教又交伯农译为法文。原葡文稿似未能保留,

今所见最早的法文本刊于巴黎,题名为《中国新志》(*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除把原文再加以分章外,法译者还根据其他同时代的材料,如汤若望、南怀仁、卫匡国的信札、著述等,加以注释。1689年有人自法文译为英文,刊于伦敦,题为《中国新史》,包括对政治体制、城镇和百姓风俗习惯等的记述(*A New History of China*)。1957年澳门又出版一个自法文译出的新葡文本《中国新志》(*Nova Relação da China*),其中又对书中一些名字略加中文注释。

此书的中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研究课题,现在的这个中译本系译自英文版《中国新史》,译名参考了新葡文本。其中“致崇高的红衣主教德斯特列阁下,法国公爵和贵族”这封书简系自法文本译出,英文本未收。法译者加的注释,亦在文后作为正文译出。页下注则为中译者注。

本书是西方早期汉学名著,其价值和优点正如伯农在本书法文版序言中所述:“这部书具有重大意义,可满足那些想了解那个遥远国度的人的好奇心,因为它如实地、一步一步地描述了著名的中华帝国最重要的东西。”

除这部《中国新史》外,安文思还有另一部著名的《1651年中国闻名的大盗张献忠暴行记》(*Relação das tyrantias obradas por Chang Hien Chungo famoso ladrao da China, em anno 1651*),原文为葡文,由卫匡国神父将抄本携至欧洲,一存科因布拉大学,另一存罗马耶稣会。据1866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古洛东所记,他在上海见耶稣会神父出示一抄本,记利类思、安文思两神父在四川开教情形,并据以写成《圣教入川记》一书,1918年印行于重庆。此一抄本当即安文思的《1651年中国闻名的大盗张献忠暴行记》。据此,此书似在中国留有抄本。

致崇高的红衣主教德斯特列 阁下,法国公爵和贵族^①

阁下:

当我决定出版这部《中国新志》时,我认为有必要同时把它献给尊驾。正是因您的介绍我才得知这部葡文手稿,又因您的命令我才将它译出。由于这几种理由,我觉得最好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您。此外我应趁此机会感谢您,在我居留罗马期间一直给予我的恩惠。阁下,这些原因让我可以自由地把阁下的大名置于我大胆出版的第一部书的首页。然而我没有忽略,尽我可能,将它整理到可以奉献的程度。我极力使我的文字明白易懂;我绘制并刻印了著名的北京城的草图,在我认为必要之处加以注释。虽然,在我竭尽所能之后,为不受责难,我不怀疑还能在其中找到可以修正之处。再者我希望,因尊敬的阁下拥有原稿,您至少将相信我译文的忠实,并且审视我是否一丝不苟地忠于原作者的意思和文字。至于在这部书中可能发现的其他缺点,阁下,我不认为应用您的名

① 这篇致红衣主教德斯特列(D'ESTREES)的信札,置于本书法文本之首页。英文本未收,此文译自法文本。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中华书局,1995年中文译本,第258页),当年主教将此书葡文手稿交伯农(Bernon)译为法语。信的作者应为伯农。——中译者注。本书页下注均为中译者注释,以下不再说明。

字和庇护加以掩盖批评,因为我一直准备在认识这些失误时予以订正;同时我认为,如果我的作品能得到您的某种赞许,将是非常有幸的。阁下比任何人更能指出此书中的优劣;虽然已出版了许多关于这个题目的书籍,但这部书的内容仍然既新鲜又奇特。我不担心您的严格审查,因为我知道您的仁慈和宽宏大度与您深邃的灵魂一样伟大。阁下,我经常荣幸地侍候您,有机会聆听您的谈话,得识真理,同时从这谈话中进而认识您的品德,您的学识及非凡的才能,如果这部书获得您慎重的认可,则无须我再作努力。而且我不必再作表示:您的名字已蕴含您的颂辞。众所皆知您所获得的尊荣:吾人至高无上的君主多次与您商谈要事;而且您始终光荣地出现在勒弗尼维斯两个最著名的舞台上,我要说的是,出现在法国宫廷和罗马宫廷。既然对于阁下获得的公众佳誉,我不能有所增添,我仅满足于保持自己一贯对您的尊崇感情,再次于此奉献我的微薄之力,并且保证我终生的深深敬重。

您的极卑贱顺从的奴仆

伯农

法文版序言

近百年来出版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书,凡读过这些书的人,会很轻易地认为他们不能从本书中得到新的信息。然而,我有信心说,只要他们下工夫去读它,他们将会从中看到他们以前在别的书中所未读到的东西。

中国是一个辽阔富饶、人口众多、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的国家,中国人工作之勤勉,政治之精明,又是那样卓绝,以致可以如实说,自从有了长途海上航行迄至于今,没有发现任何国家可与中国相匹敌。这是全世界已知的事;所以无须多说,有学识的人应当了解的是,这个题目之大可以撰写比现存多得多的书,并且足以调动那些最具才能和见识的作者。

对此可以补充说,在许多已刊行的有关这个题目的著述中,没有几部获得公众的认可,或者所述的内容能提供给我们有关这个大帝国的详情。费尔丁南·门捷斯·平脱的书^①,除了谈论葡萄牙的事外,充满神话传说,他以最丰富的想像力予以创造;而且他编织很多情节和论证,让他的读者信以为真。然而现今这都是不值一顾的错误,因为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给我们翔实地记述了有关

① Ferdinand(葡萄牙作 Fernão) Mendez Pinto,其《远游记》(*Peregrinação*)已有中文译本。